

# 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

梁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北宋时期的东京街巷呈现出强烈的空间特性。相对于唐代,宋人对于里坊的概念变得漠然,而更多地以街巷的名称来标示地理位置;同时,东京的街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性,具备了更强的经济活力。相对于地方州县,东京的街巷具有更突出的公共属性,是社会各个阶层所共享的城市空间。作为开封,其街巷空间的设施景观、活动人群及内容,均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等级色彩。

**关键词:**北宋;东京;街巷;空间特性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2-0125-11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北宋的城市布局完成了由封闭式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的转变,街巷在城市结构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街巷成为最具活力的城市空间。街巷中的社会生活更为丰富,成为最能反映东京特色的城市景观。在《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很敏锐地把街巷置于非常醒目的位置,可以说是把握住了北宋东京城的精髓。作为城市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街巷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近年来,城市公共空间也是史学研究中方兴未艾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北宋东京街巷的结构形态做过细致的梳理<sup>①</sup>。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对于北宋东京街巷所呈现出的空间特性仍缺乏深入的论述。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视野考察不同阶层和群体在街巷的各种活动,旨在探讨北宋东京的街巷空间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与公共属性。

## 一、北宋街巷的时代特征

### (一) 地标性

开国之初,北宋朝廷原本是打算继续以坊名

来作为开封的城市地标。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云”<sup>②</sup>。但是,东京开封是由地方州城扩建改建而成,所以不像唐长安那样有一个统一整齐的规划布局。而且,随着坊墙的倒塌,唐长安那种封闭式的界标明确的坊里结构已经淹没于纵横交错的街巷之中,时人对里坊的概念开始变得漠然,而更多的是以街巷的名称来标示地理位置。

据统计,《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共出现“街”字达139次,“巷”字达69次,而“坊”字则只有55次。而这55次“坊”字所搭配的词汇或者是“教坊”“茶坊”“内酒坊”“驼坊”,或者是“街坊”“坊巷”“坊市”,等等,竟然没有一次是至道元年所撰的八十“坊名”。相比之下,《东京梦华录》中有明确名称的街和巷,均分别多达30多条。这些街巷承载着城市地标定位的重要功能,街巷两侧分布着各种建筑和机构。

从《东京梦华录》的叙述方式也可看到,相当大的篇幅是以街巷为线索,移步换景地描绘沿街

收稿日期:2013-12-20

作者简介:梁建国,男,河南孟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43—60页;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4—139页;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八,太宗至道元年十一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23页。

的市井风情,这给予读者的印象自然有别于唐代以坊里为单元的棋盘式的城市景观。这种情况的形成和北宋东京以街巷为骨架的建设布局不无关系。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六月十六日,京师暴雨,“民居舍宇墙垣率多摧坏,于街巷权盖舍宇居住”<sup>①</sup>。朝廷明确下诏沿街巷修盖民舍,表明其决定舍弃旧的坊里结构,而以街巷为框架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我们考察宋人在东京的居住位置时可以发现,以坊里和街巷来标示地名的情形并存。再具体分析的话,以坊名来标示住址的,大都是一些达官显贵的宅邸,这显然是沿袭了唐代的坊望风习。此风约起于贞元、元和之际。开始主要用以称曾任宰相者,后来逐渐扩大,以至采缙铺主人、普通居士,也都被冠以坊望之称<sup>②</sup>。时至北宋,如春明坊的宋敏求家,昭德坊的晁补之家等,均属此类。但是,随着街巷地位的日益突出,以街巷来标示地名的现象逐渐流行。比如:鲁宗道,“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sup>③</sup>;张友正,“故庐在甜水巷”<sup>④</sup>;王黼,“赐第城西竹竿巷”<sup>⑤</sup>,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还出现了类似于坊望的新现象,那就是以街巷的名字来称呼主人,我们或可以谓之“街望”或“巷望”。比较有名的如居住于牛行街的王旦,人称“牛行相君”。苏轼有诗云:“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sup>⑥</sup>再如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sup>⑦</sup>。这种称呼显然是宋人比附唐

代的“坊望”而来。

至于临时租赁的客邸、旅馆,则大都是以巷名来称之。比如李邦彦、刘一止,“同僦甜水巷客邸”<sup>⑧</sup>;许将“税居于甜水巷”<sup>⑨</sup>;苏轼、范祖禹僦居“闾阖门外白家巷中”<sup>⑩</sup>,等等。

总之,随着坊制的崩溃,北宋东京的坊里结构也日渐式微,明确的坊里界标逐渐模糊,坊里作为城市地标的功能有所弱化,而街巷作为地标的功能则越来越突显。

## (二) 商业化

如果说唐代的街巷主要承载着政治社会功能的话<sup>⑪</sup>,那么,时至宋代,东京街巷的经济功能开始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北宋东京的城坊结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性,具备了更强的经济活力。除了交通的功能以外,街巷更成为士庶购物和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检索《文渊阁四库全书》可以发现,“街市”这一词汇自唐代以后的典籍中才开始出现。不过,唐长安的市场交易主要还是集中于东市和西市,而北宋东京虽然也有相国寺这样的大型市场,但商品交易已经渗透到大街小巷,街巷两侧店肆林立,到处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息。

北宋东京的邸店或旅馆多是沿街巷分布<sup>⑫</sup>。京城聚集着众多来自地方的流动人口,包括士子、地方官以及商人等,因而邸店业有着充足的客源。

① 《宋会要辑稿·瑞异》三之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② 梁太济:《中晚唐的称坊望风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③ 《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页。

④ 《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9 页。

⑤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0 页。

⑥ 《苏轼诗集》卷一五《送颜复兼寄王巩》,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43 页。

⑦ 《挥麈录·前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1 页。

⑧ 《夷坚志·三志》己卷第九《甜水巷蛤蜊》,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371 页。

⑨ 魏泰:《东轩笔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3 页。

⑩ 李廌:《师友谈记》,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2 页;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7 页;《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四部丛刊本。

⑪ 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 年第 4 期)以唐长安城为例,论述了街道的政治社会功能,并未论及街道的经济功能。

⑫ 关于宋代邸店业的经营管理,可参见林加丰:《宋代邸店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 年。

在全民经商的时代背景下<sup>①</sup>,一些达官显贵乐于将临街的宅邸改为邸店,以坐收租金。比如参知政事赵鼎致仕后归睢阳旧第,将其位于丽景门内的宅第“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sup>②</sup>。不仅是临街的宅邸,即使是小巷之中的不少民舍,也租赁出去。诸如前引的录事巷、鹿家巷、甜水巷、白家巷、饮马巷、麻秸巷以及汴河南小巷等等,都有租赁房舍的情况。民舍的大量租赁,自然是顺应了市场对邸店的需求。

在利润的刺激下,接檐私建房舍的侵街现象屡见不鲜,这直接导致街衢变得狭隘<sup>③</sup>。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决定对此进行整顿。可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很难阻止侵街现象的蔓延<sup>④</sup>。天圣二年(1024),景祐元年(1034)及元符二年(1099),还是屡屡见到禁止侵街的诏令颁布<sup>⑤</sup>。

也有不少临街的民舍被改为酒肆、茶坊。关于东京酒店茶坊的分布,有学者根据《东京梦华录》以及《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在地图上做了标示,绘制了分布示意图,并指出正店一般位于热闹的街坊桥市或者重要城门口的街市的道旁<sup>⑥</sup>。

在店铺门外还有沿街摆设的地摊。《东京梦华录》载,“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各种时令水果、吃食饮品,“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用青布伞遮阳,以床、凳作柜台,这样搭建起来的临时摊点,和接檐、侵街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扩大经营空间。相对于受到官府禁止的侵街,这种摊点由于方便拆卸和搭建而被广泛使

用。在激烈的竞争中还涌现出知名的品牌,比如,“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sup>⑦</sup>。此外,街巷上还有沿街叫卖的流动商贩,如“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sup>⑧</sup>。

街巷也是都人游乐的重要场所。一些游乐活动与餐饮业相伴而生,也是店家招揽顾客的一种方式。“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sup>⑨</sup>街头巷尾,人烟闹处多有一些民间卖艺活动。宋祁有诗《都街见缘橦伎感而成咏二阙》云:

迺望场中百尺竿,翘材飞捷过跳丸。垂堂亦有千金子,不敢中衢徒倚看。

予子危幢突倒投,负材骄压汉场优。如何日到危身地,只丐旁人一笑休。<sup>⑩</sup>

这两首诗生动地勾勒出东京城热闹的市井风貌,诗中的杂耍艺人技艺高超,每每做出一些高难动作以博得路人的笑声。

不少街巷还开设有妓馆,仅据《东京梦华录》所载,就有多条这样的街巷,如:

(曲院)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sup>⑪</sup>

①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

② 《墨客挥犀》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8页。

③ 关于侵街,可参见周宝珠《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4页。

④ 《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二月条,第1114页;《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65页。

⑤ 《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六月条,第2358页;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一月甲辰条,第2706页;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庚寅条,第12336页。

⑥ 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8—30页。

⑦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是月巷陌杂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1页。

⑧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鱼行》,第447页。

⑨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十六日》,第596页。

⑩ 宋祁:《景文集》卷二三《都街见缘橦伎感而成咏二阙》,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官宇》,第82页。

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鹤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西向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sup>①</sup>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稍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sup>②</sup>

这些妓馆大都深藏于小巷之中,也往往是豪奢纵欲的场所,所谓“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尚”<sup>③</sup>。

东京城中有不少以商业闻名的街巷。《东京梦华录》中所描述的几条重要街巷,如朱雀门外街巷、州桥外大街、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马行街、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门街巷等,无不充斥着各种商业活动<sup>④</sup>。就连御街这样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主干道,其两侧的御廊也曾被长期用作商铺,“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sup>⑤</sup>。据文彦博奏议,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差官监卖果实,分取牙利”<sup>⑥</sup>。

一些巷的名字就具有鲜明的工商业色彩,比如大小货行巷、袜襪巷、绣巷、炭场巷、草场巷、油醋巷、卸盐巷、浴堂巷等等,从巷的名字就能粗略判断出其所经营的行业门类。还有些街巷堪称专门商品的批发市场,如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sup>⑦</sup>。

有些街巷甚而直接以“市”为名,如: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

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鹤儿市。……近北街曰杨楼街,东曰庄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sup>⑧</sup>

这些街巷往往也是商品交易的市场,沿街店铺除了出售饮食外,还经营有其他各种行当,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总之,北宋东京的城市空间打破了以前那种坊市分离的布局,商品交易活动渗透到街巷深处。一些临近街巷的私人住宅改为邸店、客棧、店铺、茶坊、酒肆,甚至妓馆,其间的商业活动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街巷经济的蓬勃兴旺是东京城繁华富丽的最直观的景象。

## 二、东京街巷的公共属性

### (一) 朝廷礼仪

相对于地方州县而言,东京的街巷具有更突出的公共属性。这里所说的公共属性,主要是指街巷上活跃的各类人群及其活动内容。京城汇聚了帝国最完整的阶级和阶层,街巷是他们能够共享的为数不多的城市空间。

北宋朝廷通过在街衢上举行一些节日或礼仪活动,借以营造与民同乐的太平气氛。宋太宗时规定,在三元节等重大节日时取消夜禁,允许百姓在街上通宵游观。《曲洧旧闻》载:

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观游之盛,冠于前代矣。<sup>⑨</sup>

①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潘楼东街巷》,第164页。

②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朱雀门外街巷》,第99—100页。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七夕》,第781页。

④ 有学者列出了东京的九大商业街市,分别是南、西、北、东四条御街和宣德门前大街、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沿汴河大街等。参见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第78—79页。

⑤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御街》,第78页。

⑥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六《上神宗论市易[系第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2页。

⑦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东角楼街巷》,第144页。

⑧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潘楼东街巷》,第163—164页。

⑨ 朱弁:《曲洧旧闻》卷七《上元张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1页。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在这三个节日中,上元节最为时人所重视,节日的气氛也最为浓烈。梅尧臣在皇祐四年(1052)与宋敏修的唱和诗云:

鼓声闾阖众戏屯,百仞太华临端门。端门两廊多结彩,公卿士女争来奔。……车驾适从驰道入,灯如撒星天向昏。赭衣已御凤楼上,露台宣看簇细轳。山前绛绡垂雾薄,火龙矫矫红波翻。金吾不飭六街禁,少年追逐乘大宛。<sup>①</sup>

金輿在闾阖,箫吹满人寰。九陌行如昼,千门夜不关。星通河汉上,珠乱里闾间。谁与联轻骑,宵长月正闲。<sup>②</sup>

一岁老一岁,新年思旧年。东楼尝共望,九陌听争先。白发更中笑,舞姝应转妍。追随都已倦,强对月明前。<sup>③</sup>

端门是皇帝上元赏灯之地。“九陌”泛指都城大道和繁华闹市,这一景观意象在上元夜题材的诗篇中经常出现。上元夜的京城到处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士庶走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在朝廷与庶民同乐的氛围中,街衢作为公共空间的意义得以充分释放。

御街不仅是京城最重要的交通设施,还被朝廷塑造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礼仪空间。北宋后期,从冬至开始,到元宵节结束,在整个新年期间御街都对民众开放。据《东京梦华录》所载,过年时候,宣德门前御街上搭起山棚,上面镶嵌着大观、宣和“与民同乐”之类的金书大牌。山棚下用荆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叫作棘盆。入夜,棘盆被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同时,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sup>④</sup>。宋徽宗也会乘兴出宣德门,“与民同乐”,有两首词生动再现

了当时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sup>⑤</sup>

上元夜观灯是京城的重要礼俗,朝野士庶纷纷游观狂欢,体验京城特有的节日气氛。

北宋朝廷还沿袭前朝故事,不定期举行宴饮庆祝活动“赐酺”。赐酺时,皇帝与近臣坐在宫城宣德门<sup>⑥</sup>的城楼上,父老和蕃官坐在城楼下,士庶百姓在城楼南面的御街上,一边观看文艺表演,一边选购日常百货。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sup>⑦</sup>。这虽然是一项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其中也融汇了民俗、商贸等内容。在沸腾喧闹的气氛中,皇帝、百官与庶民一起参与到节日的狂欢之中。这类活动可以说是朝廷为了淡化统治者与士庶百姓之间的等级悬隔,而有意安排在御街上,烘托出普天同庆、君民同乐的社会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朝廷礼仪,如皇帝的寿辰宴、新科进士的琼林宴、朝中重臣的祖道饯行等,其举办地点虽非街衢之上,但沿途会经过一些街衢(主要是御街),路人得以目睹其盛大场面。

每年十月十二日宋徽宗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参加仪式的女童队伍步出右掖门,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姑娘,让她戴上花冠,

①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二《和宋中道元夕十一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592页。

②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五《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赋诗得闲字》,第267页。

③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上元夕有怀韩子华阁老》,第994页。

④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元宵》,第540—541页。

⑤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页。

⑥ 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该城楼的名称屡有变更。后梁初曰建国,后改咸安,晋初曰显德,又改名明德。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名丹凤,九年改乾元,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名正阳,景祐元年正月改宣德,政和八年十月六日改为太极之楼,重和元年正月复名宣德。

⑦ 《宋史》卷一一三《赐酺》,第2699—2700页。

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sup>①</sup>。整条御街上到处弥漫着皇帝生日的热闹喜庆,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皇家寿宴的隆重奢华。

金明池位于开封西郊顺天门(新郑门)外路北,朝廷“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sup>②</sup>。为了从这些前程似锦的新科进士中选择一位东床快婿,有女待嫁的达官显贵们清晨便驾车赶往路边等候。这一盛况也吸引了不少京城百姓旁观。苏轼诗曰:“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sup>③</sup>当新进士们身着绿衣经过之时,各家便争相选人。当日得中东床之选者,往往十之八九。京城是北宋科举考试的所在地,有着浓郁的科举文化氛围。不过,省试、殿试以及其他庆典仪式大都在官署及宫廷御苑等场所举行,普通庶民难得一观,唯有新科进士往赴琼林宴时,可以在路上一睹这些才俊的风采。王安石有诗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sup>④</sup>这样的旖旎风光,不仅当事人终生难忘,而且对围观者也是巨大的刺激和鞭策。

有些宠臣在告老还乡时,朝廷为其祖道钱行。咸平三年,翰林学士朱昂离京那天,宋真宗“命两制丞郎、三馆臣寮祖道于南熏门,中使赐宴于玉津园”。南熏门乃东京外城的正南门,位于御街的南端,与内城的朱雀门、宫城的宣德门同在东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过往人群的川流不息也可想而知。玉津园正位于南熏门外,横跨大道的两侧。钱行活动安排在如此热闹的公共空间,这一活动也就带有了公众活动的色彩。如此多的缙绅同时出现在御街,“冠盖盈路,供帐甚隆”,士庶百姓也得以直观感受到这种朝廷的威仪和排场,从而产

生“荣动中外,光震都国”的轰动效应<sup>⑤</sup>。

总之,朝廷主导的很多公共礼仪或节日活动经常安排在御街上举行,东京御街所具有的鲜明的政治社会功能是其作为京城而有别于地方州县的重要特性。

## (二) 民众生活

除了以上所论均的朝廷主导的活动之外,还有一些士庶民众的活动也发生于街巷。街巷对于民众是开放的,因而也是朝野各阶层共处的城市空间。不过,街巷的公共性并非完全不受限制,而是要受到官府的管理和控制。

士庶的日常生活与街巷关系密切,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上朝出游,要到达目的地都需要走街串巷。诗人有很多诗篇都对途中经过的街巷景致有过描写,比如:

红尘夜不息,横衢若烟雾。朝见车马来,暮见车马去。车中目炯炯,马上情遽遽。<sup>⑥</sup>

驱马傍驰道,归自许西偏。高车非旧贵,立避槐树边。<sup>⑦</sup>

高车大马,红尘滚滚,这些街巷景观是梅尧臣对于京城的重要印象。他还有一些酬唱诗也是以御街为创作背景,诸如《次韵和永叔退朝马上见寄兼呈子华原甫》《次韵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过景灵街》《上马和公仪》,等等<sup>⑧</sup>。

除了御街而外,京城的陋巷景观也时常出现在时人的诗歌中。梅尧臣居住在东水门外汴阳坊的陋巷中,前来造访他的友人不乏达官显贵。比如嘉祐三年(1058)的一个晚上,司马光和钱公辅乘坐马车而来,尧臣诗云:“天京二贤佐,向晚忽来觐。……移榻近檐楹,谈诗俄至夕。回车闾巷

①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第835页。

②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③ 《苏轼诗集》卷五《和董传留别》,第222页。

④ 《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三,四部丛刊本。

⑤ 夏竦:《文庄集》卷二八《朱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一《夜与邻几持国归》,第583页。

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七《答显忠上人》,第409页。

⑧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次韵和永叔退朝马上见寄兼呈子华原甫》,第1058页;卷二九《次韵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过景灵街》,第1070页;卷二七《上马和公仪》,第937页。

隘,跛马愁所历。”<sup>①</sup>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与刘敞、范镇、何郯等人来访尧臣,“车马立市中”,“市人无不惊”<sup>②</sup>。街坊邻居看到骑着高头大马的官人云集尧臣门前,不由惊叹。嘉祐五年(1060),京师大疫,尧臣不幸染疾。次日,朝中的贤士大夫纷纷奔赴尧臣家中往问疾,“驺呼属路不绝”,以至于开封城东“市者废,行者不得往来”,路人都面面相觑:“兹坊所居大人谁邪?何致客之多也!”尧臣病卒后,“贤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sup>③</sup>。在梅尧臣患病以及逝世之时,前往探视吊丧的士大夫络绎不绝,以至于拥塞道路,沿街商贩无法买卖。一时间,街道上往来的人群除了贩夫走卒、庶民百姓,还有达官显贵,这样的场面也只有京城才会出现,正体现出京城街衢上活动人群在阶层上的丰富性。

胡瑗、郑穆等名公巨卿告老还乡时,弟子为其送行,其壮观的场面也是京城街衢的一道独特景观。这两次送别活动的发起都离不开太学生,而活动被安排于街衢这样的公共空间,其影响遂扩大到京城的普通百姓,形成轰动朝野的社会效应。<sup>④</sup>

街巷上的偶然相逢,也构成人际互动的一种情形。庆历元年(1041)初夏,梅尧臣有诗《吊石曼卿》回忆几年前在京城街头与石曼卿骑马相遇的情景,诗云:“前时京师来,对马尝相揖。埃尘正满衢,笑语曾未及。”<sup>⑤</sup>

才子佳人的街头邂逅更为东京街巷平添了一抹浪漫色彩。宋祁的著名词作《鹧鸪天》就描写了一段马路情缘,词云: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sup>⑥</sup>

据这首词的题注所云,宋祁是前往南郊的繁塔寺踏青,遇见宫车路过繁台街,宋祁赶紧避让于道旁。这时宫车内有一宫女掀开轿帘,正好看到宋祁,就唤了一声“小宋”。宋祁应声望去,但那宫女已随着宫车消失在车水马龙中。宋祁受宠若惊,又怅然若失,遂作词纾解心中的绵绵情思。这首优美的词作很快传遍京城,连宋仁宗也知道了。仁宗遂成人之美,将“肇事”的宫女赐予宋祁。路上的意外艳遇,不仅催生了文学史上的一首绝妙好词,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京城庶民虽然生活于天子脚下,却与皇室隔着厚厚的宫墙,绝少有进入宫廷内苑的机会。他们对于皇家威仪的感受主要来自于在街巷上旁观到的皇家礼仪,诸如皇帝车驾行幸,皇太子纳妃,公主出降,皇太后、皇后出乘等等。这些活动构成京城独有的景观,为人所瞩目。通过街衢上这些仪卫场面,庶民得以感知排场威严的帝都气象。

街衢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为各个阶层所共享的城市空间,社会下层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利用街衢接近长官,制造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比如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当时士子崇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决定予以排抑,凡是这种风格的考生都被黜落榜,结果遭到强烈反对。一些人轻薄举子为宣泄不满,“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sup>⑦</sup>。由于欧阳修的私人住处或者办公的衙署等空间均不可能随意进入,这些举子为见到欧阳修,遂选择街道这一公共空间。

街巷虽然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但其中的活动并非不受约束或限制。北宋官府对于东京的街

①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第1023页。

②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九《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第1125页。

③ 《欧阳修全集》卷三三《梅圣俞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6页。

④ 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送别》,《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一《吊石曼卿》,第185页。

⑥ 《花庵词选》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⑦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78页。



道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sup>①</sup>。宋初,东京城是由禁军维护日常治安,至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亲自遴选,在左、右金吾街司各置兵士千人,“优以廩给,使传呼备盗”<sup>②</sup>。金吾街司是东京城特设的治安管理机构,其下分左、右金吾街司,宋初置左、右街使。太宗朝后,置判左、右金吾街司事官,或置勾当官、知左右街司事等。人吏有孔目官、表奏官、兵士。金吾街司的主要负责击街鼓(包括五更报点)、警场、清道、巡逻京师街道、传唤备盗、纠察违制犯法行为,请纳鼓契等街道管理事宜。<sup>③</sup>《春明退朝录》载:“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此后金吾之职废矣。”<sup>④</sup>也就是说,至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街鼓昏晓之制消失<sup>⑤</sup>。街鼓的废止只是说明了金吾街司不再以击街鼓的形式进行报时,而其他的警场、清道、巡逻京师街道等治安事宜仍然是金吾街司的职责。在嘉祐二年举子拦截欧阳修的事件中,仍可以看到“街逻”的干预,这里的街逻就是对金吾街司执法人员的通俗说法。可以说,随着里坊制的崩溃,唐代那种封闭式的里坊结构被打破,宋代东京城的基层治安活动开始以街巷为单元开展,这明显有别于唐代那种以里坊为单元的治安体制。即使是北宋后期,街道的管理改由禁军管理,禁军依然是沿着街巷进行巡逻。

京城乃天子脚下,街巷上难免会出现皇帝行幸的御驾。有研究指出,北宋皇帝的行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帝为多,行幸是为了和庶民交流,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sup>⑥</sup>。皇帝在车驾行幸之时,还会通过仪卫之制来防止士庶靠近御驾。在宋朝前期,仪卫之制比较简单。正如宋庠所言:

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鹵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礼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楫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輿相远;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冯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咸令弛阙,玩习为常。<sup>⑦</sup>

可以说,皇帝出行时虽有禁卫、街使等安保人员,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都城士庶还是有机会接近皇帝的仪仗。北宋中后期以后,礼仪制度逐步得到整顿和强化。仁宗康定元年(1040),朝廷在宋庠的建议下,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参照前代旧仪,制定新的仪制:

凡车驾经历去处,若有楼阁,并不得垂帘障蔽,及止绝士庶不许临高瞰下,止于街两旁立观,即不得夹路喧呼驰走。前牙门以前,后牙门以后,不在此限。凡车驾未出皇城门,宣德、左右掖、东华、拱宸门及已至所幸处,即自有门禁,不用牙门旗约束。凡车驾已在道,前牙门旗虽行,后牙门旗未行,除止绝闲杂行人外,其随驾臣僚官司人等,并依常例,次第赴合随从及行马去处。凡前牙门旗在清道马后约十步已来,后牙门旗在驾后殿前指挥使之后。凡街巷宽阔处,仪卫并依新图排列。如遇窄狭街巷,禁卫止用亲从官二重,御龙直二重,雉扇随辇。其殿前指挥使、天武官,并权分于驾前后随行。后至宽阔处,乘輿徐行,仪仗依旧排列。或驾幸园苑、宫观、寺院并臣僚宅,即清道马、仪仗、殿前指挥使、天武官更不入,惟于外排立。其随驾臣僚及诸司人,自依常例随从,候驾行,依次排列。<sup>⑧</sup>

① 杨瑞军:《北宋东京治安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一三。

③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7页。

④ 《春明退朝录》卷上,第11页。久保田和男先生指出,街鼓的废止并不能表明夜禁的废止,直到北宋末期,东京仍然施行夜禁制度。参见氏著:《北宋东京的市容和治安制度》,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418页。

⑤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239—277页。

⑥ 久保田和男:《关于北宋皇帝的行幸》,平田茂树、远藤俊隆、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 《宋史》卷一四四《行幸仪卫》,第3387—3388页。

⑧ 《宋史》卷一四四《行幸仪卫》,第3389—3390页。



这些举措在街巷这一公共空间为皇帝构筑了一个私人空间,其范围是前牙门以后与后牙门以前。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隔绝士庶与御驾之间的距离,“每值驾出,甲马拥塞驰道,都人仅能于御盖下望一点赭袍”<sup>①</sup>。宋徽宗时,礼仪制度更为严苛。绍圣年间(1094—1098),“约栏尤更严肃,几不容士庶观觐。”<sup>②</sup>很显然,街巷这一空间的公共性受到皇权的更严峻的挤压。这些繁文缛节的禁卫制度,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证皇帝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则是意在向士庶民众宣示皇权的高高在上,进而强化社会尊卑的等级观念。

### (三) 等级色彩

虽然街巷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但作为京城的开封,其街巷的设施景观、活动人群及内容,均呈现出更为森严的等级色彩。在时人的眼里,可以明显感觉到不同级别的街巷在设施环境上的景观差异,这也是官府的等级意识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自觉体现。

街与巷,原本同为城市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一致的,其区别主要在于形态与大小,所谓“直为街,曲为巷;大者为街,小者为巷”。如果说街是城市交通的动脉,巷则是毛细血管,纵横交错,遍布全城,数量庞大,难以计数。正如《东京梦华录》所云:“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sup>③</sup>;“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袄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sup>④</sup>这里所描述的区位已经是在旧城以外了,城内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北宋东京的主要街道,除御街宽一百丈左右(阔二百余步)外,其余大街或二十丈,或十丈以下,当然也有很窄的敝巷小

道<sup>⑤</sup>。东京城内南、西、北、东四面御街是最为重要的街道。其中,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的这条南北向的御街,规格最高、景观最美。大中祥符五年(1012)二月,诏:“乾元门至朱雀门及皇城四面,每岁植树,自景德四年至今,尚未得茂盛,可委勾当皇城司刘承珪专切管勾。”<sup>⑥</sup>乾元门即宣德门,由此向南到朱雀门这段南北御街是官府绿化的重点监管区域之一。宣和年间(1119—1125),更是在御沟中尽植莲花,两侧的御柳改种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宛如锦绣。

御街,特别是宣德门向南的御街,是皇帝的专用车道,皇帝以下的大臣、百姓,甚至皇亲国戚都不能僭用。晁补之有诗《御街行》云:

双阙齐紫清,驰道直如线。煌煌尘内容,相逢不相见。上有高槐枝,下有清涟漪。朱栏夹两边,贵者中道驰。借问煌煌子,中道谁行此。且复就下论,驄马知杂事。官卑有常度,那得行同路。相效良独难,且复东西去。<sup>⑦</sup>

诗人目睹所见景观,能够明显感受到其所展示出的尊卑观念。御街的中道平时只对达到一定品衔的所谓贵者开放,新科进士唱名赐宴后也可以享受一次“御街驰骤”的待遇。也许正因此,能在御街“中道驰”的宋代士大夫,得以体验到出人头地、富贵荣华的快感。李若水有诗为证:

雪意融融旋作泥,故山应是费攀跻。而今把笏谢樵子,马踏御街闻晓鸡。<sup>⑧</sup>

冬日上朝途经御街的官员,马踏着融雪,手持着朝笏,耳听着报晓的鸡声,回想起故山的樵子,油然而生的是仕途上的成功与荣耀感。以御街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已经深入人心,构成为时人等级观念的一部分。此外,御街上所举行的朝

① 周辉:《清波别志》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周辉:《清波别志》卷三。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十六日》,第596页。

④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马行街铺席》,第312页。

⑤ 周宝珠:《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页。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〇。

⑦ 晁补之:《鸡肋集》卷八《御街行》,四部丛刊本。

⑧ 李若水:《忠愍集》卷三《次韵舒伯源雪晴偶书四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廷庆典或皇家礼仪活动,也是京城有别于州县的独特之处。

牙道也称官道,是仅次于御街的城市干道,其绿化和维护也受到官府的重视。新城“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sup>①</sup>

与御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陋巷”,也称为“穷巷”“委巷”等,这一类词汇在史籍中多有出现,均意指偏僻简陋的小巷。宋初,京城的住房条件不好,“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sup>②</sup>,东京城的小巷中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官员。比如枢密副使杨砺,“僦舍委巷中”,咸平二年八月病卒,宋真宗幸其第临奠,“乘舆不能入,帝为冒雨步进焉”<sup>③</sup>。宋仁宗时修订新的“行幸仪卫”,还专门规定:“或臣僚宅在巷内,前去不通人行处,其仪仗、殿前指挥使等,各于巷口排立,止绝行人,余并如故。”<sup>④</sup>由于巷道比较狭窄,高车大马无法进入,仪仗及扈从人员只能停留在巷口。

也有一些豪宅隐藏于陋巷深处。比如石曼卿独行京师,被一豪士邀过其家,“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饰宏丽,锦绣珠翠,殆非人间所拟”<sup>⑤</sup>。再如宋徽宗赏赐王黼的宅第,位于“城西竹竿巷,穷极华侈,累奇石为山”<sup>⑥</sup>,也是一处豪宅。

陋巷之中更多的是科举不第或仕途失意之人,他们弃绝功名,潜心治学,“闭门陋巷中,闷默阅书史”<sup>⑦</sup>。这些身处陋巷的底层士人还担当着民间教育和学术文化的传承,如寿春人冯贯道,“举进士不偶,弃去,游京师,居相国寺东录事巷,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sup>⑧</sup>。其中才学出

众者也为朝廷所瞩目,比如王回,“身穷于陋巷,而名已重于朝廷”<sup>⑨</sup>。在这样的语境下,陋巷这一概念是与朝廷相呼应。在时人的笔下,“陋巷”常常传达的是一种经济上的贫窘、精神上的失意,呈现的是游离于朝廷之外的隐居状态。皇祐二年,欧阳修有诗云:“念子京师苦憔悴,经年陋巷听朝鸡。儿啼妻噤午未饭,得米宁择秕与稊。”<sup>⑩</sup>陋巷中的清苦生活与御街上皇家礼仪的赫赫声威、金明池上路的春风得意形成了强烈对比。

## 结 语

随着坊墙的倒塌,北宋东京的坊里结构已经变得模糊,时人开始流行用街巷来作为城市的地标。以前那种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商品交易活动渗透到大街小巷。如果说唐代以前的街巷主要承载着政治社会功能的话,那么北宋街巷的经济功能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街巷可以称得上东京城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街巷上所发生的活动及社会事件具有较强的公众性,容易引起相应的社会影响。朝廷为了塑造亲民的形象,也会通过一些节日和礼仪活动营造“与民同乐”的太平气氛。街巷是朝野各阶层共处的城市空间,但并非不受限制,其公共性在帝制国家首先要从属于皇权,而是要受到官府的管理和控制。朝廷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建构一个尊卑有序、上下谐睦的社会秩序。帝制时代的都城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皇权的影响,北宋东京的街巷空间也笼罩着皇权的色彩,这也是其不同于地方州县的重要特征。街巷面貌的差异化是社会等级在城市生活上的呈现。御街的宽阔气派彰显的

①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东都外城》,第2页。

②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5页。

③ 《宋会要辑稿·礼》四一之一五。

④ 《宋史》卷一四四《行幸仪卫》,第3390页。

⑤ 刘攽:《中山诗话》,《宋诗话全编》,第451页。

⑥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一,第230页。

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五《史尉还乌程》,第273页。

⑧ 邹浩:《道乡集》卷四〇《冯贯道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欧阳修全集》卷七二《祭王深甫文》,第1044页。

⑩ 《欧阳修全集》卷五《再和圣俞见答》,第82—83页。

是皇家的威仪,陋巷的狭窄逼仄是平民生活的写照。

此外,与街巷的含义基本近似的概念还有里巷,又称闾巷、坊巷、衡巷等,都意指平民居住的小街道,但其使用的具体语境则有所差异。街巷和坊巷侧重于物质空间的实体,前者更侧重于出行的空间,坊巷则更侧重于居住的空间。里巷和闾

巷虽也有出行和居住空间的含义,但更多的时候是借指平民,或泛指乡里民间,具有抽象的人群意义,而且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在史籍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里巷”或“闾巷”经常与“朝廷”相对举。相对于朝廷而言,里巷有其基层性和民间性,这一空间中活动的人群体现着民间社会的动态。

##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eets in Kaifeng,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ang Jianguo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streets in Kaifeng,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typical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became indifferent to the concept of Fang (坊, lane), and marked the location by street names more frequently.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eets became unprecedentedly commercially-oriented and economically vigorous. Unlike that in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 space of the streets in Kaifeng had more prominent public features, and was shared by the city dwellers from various social classes. The facilities, landscapes, inhabitant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street space of Kaifeng as the capital city, showed mo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Key word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aifeng, stree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 管 琴)